

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逻辑及其危机机制

崔慧敏

[摘要] 西方资本主义从一般资本统治向金融资本统治的转变过程中，资本积累重心也由生产性积累转向非生产性积累。生产性积累是指资本在生产领域通过剥削雇佣工人的无酬劳动获得剩余价值的积累方式；非生产性积累是指资本在分配领域通过暴力、投机等方式剥夺剩余价值的积累方式。剥夺性积累作为当代西方金融资本主义非生产性积累的现实表征，它以公共资产的私有化为基础、以信用体系为工具，以投机和寄生为主要特征，对社会各阶层进行财富掠夺。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内在地蕴含着反生产性积累的力量，持续扩张的虚拟资本投资会削弱实体经济的规模，导致产业萎缩，而信用体系的过度滥用则会引发债务危机。西方经济可能在产业萎缩和债务危机的交互作用下陷入停滞，甚至面临更深层次的金融危机。

[关键词] 金融资本 剥夺性积累 虚拟经济 产业萎缩 债务危机

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金融资本的迅猛崛起已成为主导全球经济的重要力量。然而，金融资本的扩张既带来了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更引发了广泛的社会不平等和系统性经济危机等问题。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积累与危机机制，以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进行了重构，并提出了“剥夺性积累”的概念，用以解释金融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不公平掠夺和暴力性特征。剥夺性积累是金融资本在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前提下，通过金融化和信用工具，以及环境掠夺、危机操纵等手段，实现财富和收入向上层阶级或较富裕国家流动和集中的一种积累策略。这种积累方式不仅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差距，还对社会生产和经济稳定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一、资本积累的双重路径：生产性积累和非生产性积累

在资本主义框架下，剩余价值是资本积累的主要源泉，其获取主要通过两种方式：生产性积累和非生产性积累。生产性积累发生在生产领域，资本通过剥削雇佣工人的无酬劳动，从而获得剩余价值；非生产性积累则发生在分配领域，资本通过使用暴力、投机等非生产手段来掠夺剩余价值。这两种积累方式虽然方法不同，但都是资本主义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性积累侧重于

推动生产发展，通过创造新的剩余价值来增加利润；与之相对的是，非生产性积累不直接依赖生产发展，而是通过财富所有权的变动来实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这两种积累方式各占据不同的地位，展现出不同的特点和手段。因此，理解资本主义的动态发展需要考察这两种积累方式及其在不同时期的相对重要性。

（一）资本主义积累的本质目标：价值增殖

在资本积累过程中，“价值增殖是决定目的”^①，这种增殖最显著的特征表现为预付资本的不断增多。在这一体系中，货币不仅是所有商品的一般等价物，而且是可以“生金蛋的”^②母胎，更是“可以由私人占有和使用的社会权力的化身”^③。资本家生产的动机和目标在于货币增殖，即利润的最大化。因此，作为目的的货币被视为价值增殖的表现形式，它既是资本积累过程中经济活动的出发点，也是复归点。马克思明确指出，“以实在货币为起点和终点的流通形式 $G \cdots G'$ ，最明白地表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④。在这种模式下，资本家期望从流通领域中回收的货币价值超过其投入的价值，以此增加资本量。然而，货币作为物质财富的一般代表（具有转化为任何商品的能力）与每个具体货币金额的有限性产生了矛盾，货币这种量的有限性和质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迫使货币贮藏者不断地从事息息法斯式的积累劳动^⑤。可见，资本生产的最终目的是获取最大利润和更多货币——货币不仅是生产活动的起点和结果，而且是衡量经济成功的关键指标。资本家只有在生产能够带来利润的前提下，才会进行投资。当实体经济增长放缓或利润率下降时，资本家的生产动力和意愿也随之下降，他们可能会转向金融投机等非生产性活动，以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

（二）早期资本主义价值增殖的核心机制：生产性积累

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价值增殖主要通过产业资本的生产性积累实现。产业资本循环以 $G - W \cdots P \cdots W' - G'$ 的形式表现出来。产业资本循环包含三个阶段。在 $G - W$ 阶段，拥有货币的资本家以买者的身份进入商品和劳动市场，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实现货币资本向商品资本的转化。在 $\cdots P \cdots$ 阶段，资本家利用购入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进行生产活动。通过工人的无酬劳动，其所生产的商品价值远超其预付资本的价值。在 $W' - G'$ 阶段，资本家以卖者身份返回市场，出售他们所生产出的商品，将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从而实现预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这一循环不仅显现了产业资本的核心目的——资本增殖，而且展示了资本如何通过不同形式的转换持续实现价值的再生产和财富的增长。生产性积累作为早期资本主义获取利润的主要方式，本质上是一种剥削性积累，即通过剥削劳动力获取新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不断增加，通过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形式实现。同时，借贷资本和货币资本等非生产性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0页。

③ [美] 大卫·哈维：《资本的限度》，张寅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39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页。

⑤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6页。

资本的积累也支持了产业资本剩余价值的创造，共同推动社会历史的进步。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的生产性积累不仅体现了资本的自我扩张能力，还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中剩余价值积累和资本循环的复杂性。

（三）金融资本主义价值增值的变革路径：非生产性积累

尽管“发财致富本身才是生产的自身目的”^①，但资本主义生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经历一个不断往复的循环过程。在其中一个阶段上的任何停滞，不仅破坏这个阶段的资本循环，而且会使整个单个资本的总循环发生或大或小的停滞^②。这就导致了“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③。这种趋向于绕过生产过程直接实现货币增值的积累方式就是非生产性积累，其实现依赖于特定的条件，如资本的规模和市场的垄断程度等。对产业资本家而言，虽然价值增值离不开生产过程，但对于快速致富的渴望却驱使他们幻想能够脱离实际生产过程来实现货币增值。在资本主义进入金融资本主义阶段之后，这种非生产性积累不再是幻想而成为现实。公共资产的私有化、商品化和金融化，使货币资本从传统的产业资本循环中脱离，直接实现了G-G'循环，“一切东西都会增加一倍和两倍，以至变为纯粹幻想的怪物一样”^④。在资本过剩条件下，货币资本衍生出自我运转的循环机制。这种形式的货币回流时间短、速度快、收益多，并且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这样，“和资本的现实增值过程的一切联系就彻底消灭干净了。资本是一个自行增殖的自动机的观念就牢固地树立起来了”^⑤。非生产性积累是基于剩余价值的再分配，是“坐享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中一个这样无须他参与而不断增大的份额”^⑥。它本质上是一种攫取和转移由生产性积累创造出的财富的机制，并没有增加社会总体财富。

二、剥夺性积累：金融资本非生产性积累的现实表征

在金融资本主义中，非生产性积累作为资本家对财富无限追逐的核心机制，成为当代财富积累的现实表现。大卫·哈维将这种积累模式定义为“剥夺性积累”，描述了资本家依靠公共资产的私有化以及占有自然资源、土地交易、国债投机等手段，从其他社会阶层掠夺财富的过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种剥夺性积累日益成为资本主义的主流积累方式。“新自由主义的近期发展，尤其是经济的金融扩张，揭示了各种形式的剥夺是历史资本主义的当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6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9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19页。

代特征。”^① 金融资本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导力量，展示了其脱离传统生产过程直接掠夺剩余价值的的能力。这种趋势在金融产品数量增加和虚拟经济扩张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日本学者宇野宏藏指出，“金融资本被视为具有自动生息能力的资本。它是资本的最复杂形式，本身已经以自动生息资产的形式成为一种商品（它似乎离生产过程最远），正如土地一旦被商品化，就可以被视为一种自动承担租金的资产一样”^②。随着金融资本垄断地位的不断加强，它基于公共资产的私有化、信用体系的运用，以及其寄生性和投机性的特点，构建了一个复杂的剥夺性积累体系。这一体系已深入渗透至各种经济关系中，对社会所有阶层进行财富的系统性掠夺。

（一）剥夺性积累的基础：公共资产的私有化

在新自由主义政策框架下，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通过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来维持。马克思在分析高利贷资本时就已经提出：“高利贷者不满足于只榨取他的牺牲者的剩余劳动，而逐渐取得了对后者的劳动条件本身的所有权，即土地、房屋等等的所有权，并用这种办法不断地对后者进行剥夺。”^③ 同样，金融资本对公共资源和社会生活领域的所有权垄断正是剥夺性积累的前提。20世纪70年代，以英美为主导的西方发达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其核心思想是推进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即把国家所掌握的公共资产，如住房、教育、医疗、交通等释放到市场中，允许自由交易买卖。这些公共资产随即被金融资本以低价收购，变成了私有财产。“房地产投机收买、哄骗或强迫低收入人群搬到诸如伦敦等大城市的边缘地区，然后把之前工人阶级的房产改造成成为高档住宅中心。”^④ 土地的高度商业化为金融资本提供了地租和地价增值的机会，导致普通民众的住房租金大幅提高。如2018年第二季度，租住在最廉价出租房里的美国低收入家庭，每个月的房租占收入比高达62.7%^⑤。这种情况显著增加了民众的生活成本，加剧了社会经济的不平等。

在自然资源的私有化进程中，金融资本通过购买、囤积，以及操纵自然资源如土地、水资源和矿产资源等，来影响市场的供需关系，抬高资源价格，从而获得高额利润。这种市场操纵行为加剧了资源的稀缺性，提高了公共资源的获取成本，使得普通民众承受巨大经济压力。如“智利80%以上的水资源掌握在私人手中，用于工业生产、采矿、农业和畜牧业，导致智利人饮用水短缺，并受到工业废物的污染”^⑥。金融资本通过购买大片农田和水源地，控制了这些地区的

① Daniel Bin, “So-called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Critical Sociology*, Vol. 44, No. 1, 2018.

② [日] 柴崎慎也等：《什么是商业资本？——日本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市场理论的贡献》，江原庆、蒋林、张可人译，《国外理论动态》2022年第5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3-674页。

④ [美] 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付克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93页。

⑤ 参见宋朝龙、吴迪曼：《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与21世纪新版大萧条》，《当代经济研究》2021年第10期。

⑥ Jessica Rothwell, “Chile’s Water Crisis”, <https://lab.org.uk/chiles-water-crisis/#:~:text=Water%20is%20unevenly%20distributed%20throughout,government%20is%20refusing%20to%20address>.

水权和土地使用权。这种控制不仅导致当地水资源价格上涨，还影响了农业生产，使得当地农民难以承担灌溉成本。在新自由主义的对外扩张中，发达国家通过与发展中国家签定短期协议来获得对后者丰富自然资源的访问权，并将那些环境污染严重、生产风险较高的制造或加工活动迁移到这些具有较低劳动力成本、较大市场潜力和资源丰富的地区。但是，在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金融资本往往忽视或有意外部化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加剧了环境退化和生态失衡，同时也加重了社会不公和贫富差距。例如，多国石油公司在尼日利亚进行开采活动，不仅占据了大量土地和水资源，还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这些公司往往借助当地政府的支持，以低成本生产却高价出售石油，而保护环境的成本却由当地社区和政府承担。这种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策略，虽然在表面上看似带来经济繁荣，实际上却在不断加深社会不平等和环境退化，挑战着全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在私有化的过程中，传统的私人财产观念已经不只局限于物质层面，而是扩展至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更广泛范畴。这种扩展不仅涵盖了实体资产，还包括了思想和创意。金融资本通过将知识产权法律框架应用到思想和创意上，有效地将这些非物质资产商品化，从而获取新的垄断租金。首先，金融资本利用知识产权促进了市场的垄断，通过限制访问和提高许可费用来提升利润，这在音乐、电影和软件行业尤为明显。例如，“声田”（Spotify）和“奈飞”（Netflix）等平台通过严格的版权管理限制内容自由流通，同时通过订阅和许可费用获取高额利润。这种独占常常通过法律诉讼和严格的版权执法来实现。有学者指出，版权法的本意是保护个人作者的创作成果。然而，音乐、电影和软件公司等大型企业现在却引用版权法来证明其提取垄断租金的行为是合理的^①。其次，在基因材料、物种、低碳技术等高科技领域，金融资本通过技术专利形成垄断价格，并依靠这种定价权获得高额利润。例如，在今天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各国面临着节能减排的迫切任务，但发达国家在新能源和减排技术上拥有垄断地位，这使得发展中国家在采用这些新技术时必须支付昂贵的专利费，仅中国向美国支付的技术专利使用费就从2007年的80亿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290多亿美元^②。总之，金融资本在全球新自由主义浪潮中，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剥夺和侵占行动，其目标是公共资产和公共物品，包括自然资源、土地空间、工资、可支配收入、财产和养老金，以及大量基本权利如医疗、教育和社会保护制度等，加速了财富的向上流动和再分配。

（二）剥夺性积累的工具：发达的信用体系

信用体系在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哈维指出，“信用体系包含了一种潜力，可以跨越生产与消费之间、生产与实现之间、当前的使用与未来的劳动之间，以及生产

^① Hart John Keith, “The Rise and Fall of National Capitalism”, *Economic Anthropology*, Vol. 11, No. 1, 2024.

^② Cassandra Sweet and Dalibor Eterovic, “Do Patent Rights Matter? 40 Years of Innovation, Complexity and Productivity”, *World Development*, Vol. 115, 2019.

与分配之间的对抗。”^① 因此，信用体系可以帮助金融资本建立一种虚拟资本，使货币资本无需依赖具体的商品交易就可以随意流动。在股份公司形式中，基于信用的股票被发行并在股票市场中流通。尽管这些股票是未来生产收益的凭证和所有权证书，但是它与其所代表的产业资本的实际循环却没有直接关系。事实上，这种以未来收益为依据的股票价格是虚拟的，它只是实际存在的产业资本及其利润的凭证，但这种凭证可以在市场上交易。这样，在带来利润的资本向带来利息（或股息）的资本的转化过程中会产生一个创业利润。“产生平均利润的资本与产生平均利息的资本之间的差额，这种差额表现为创业利润。”^② 这种创业利润所代表的收益却远超实际的生产收益。2010年6月，特斯拉在上市过程中筹集了2.66亿美元。尽管公司从未盈利，但每股股价却达到了17美元，开盘当天收盘价为24.64美元^③。于是，在股票的购买中，散布在社会各阶层的闲置资金被集中到大资本家手中，金融资本的货币动员能力也大大增强。

在新自由主义私有化进程中，金融资本通过提高垄断价格增加了公众的生活成本，这不仅为消费信贷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金融资本构建起一种“新型高利贷体系”剥夺消费者提供了便利。在金融资本对消费领域提供大量信用的过程中，深受金融化和虚拟化的资本逻辑影响的消费观念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负债购房、奢侈品分期付款、信用卡支付等已成为主流的消费模式。因此，许多人为了满足消费需求而背上了长期、高额的贷款，进而沦为高度负债的状态。这使得他们为了偿还债务不得不持续努力工作。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出现工资持续下降，但整体消费水平却不断提高的矛盾现象。其根源在于美国家庭越来越依赖举债消费，已形成巨大的家庭债务泡沫^④。消费者所有的工资收入和未来预期收入，多数都流入了金融资本家的腰包。债务和利息的不断增多几乎透支了劳动者全部的未来再生产价值，减少了他们的可支配收入，并进一步增强了他们对消费信贷的依赖。这种对消费信贷的依赖还导致了社会的深层次问题。例如，高额的房贷和车贷使得年轻一代在进入职场初期便背负沉重的债务压力，这种高负债状态增加了他们心理压力，引发了一系列的心理健康问题。金融资本通过剥夺性积累，不仅在经济层面上攫取了大量财富，还在社会和心理层面上对劳动者造成了负面影响。

公共债务也是剥夺性积累的重要杠杆之一，“它像挥动魔杖一样，使不生产的货币具有了生殖力，这样就使它转化为资本，而又用不着承担投资于工业甚至高利贷时所不可避免的劳苦和风险”^⑤。美国政府债券市场是世界上最大和最活跃的市场之一，金融机构、外国政府和其他投资者广泛持有美国国债。根据美国财政部最新公布数据显示，截止2023年6月，美国国债规模突

① [美] 大卫·哈维：《资本的限度》，张寅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449页。

② [德] 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福民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11页。

③ Stuart C. Gilson and Sarah Abbott, “Tesla Motors (A): Financing Growth”, <https://ssrn.com/abstract=3156025>.

④ 参见王姝：《美国家庭债务泡沫》，《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11期。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65页。

破 32 万亿美元^①。金融资本通过在国债市场上的活跃操作，如大量购买或抛出等，来对债券价格和收益率施加影响，从而为金融机构在波动的市场中创造了巨大的套利机会。例如，大型银行和对冲基金利用先进的金融模型和大数据分析，预测国债收益率的变动，通过及时买入低价债券和卖出高价债券，实现货币增值。而中小投资者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操作能力不足，往往难以从这种市场波动中获益，反而可能遭受损失。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一些金融机构通过在危机前积极购入国债，并在市场恐慌期间抛售，获得了高额利润，而普通投资者则因市场波动而承受巨大的损失。金融资本利用国债所进行的剥夺性积累，实质上是在利用公共资产和政府信用进行财富剥夺。这种机制依赖于政府的税收权力，即通过征税从全体纳税人手中转移财富，用于支付国债的利息和本金，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财富的重新分配。这种通过金融机构间接影响经济政策和财政决策的做法，加深了金融资本对经济政策的潜在控制，进而可能导致政策制定更偏向于资本市场的利益集团，而非广大民众的福祉。

（三）剥夺性积累的主要特征：投机性和寄生性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金融资本在强劲的金融化浪潮中日益投机化。在巨大的投机利益引导下，社会主体的热情被不断动员起来，众多企业的利润以及劳动者的储蓄等货币资本被引导进入证券市场，用来维系虚拟资本“增殖”的空洞幻象。随着私有化进程的推进和信用体系的扩张，金融资本投机的领域也逐渐拓展——虚拟证券、信息技术等成为金融资本主要投机的领域。金融资本家凭借其在资本集中和动员中的地位，通过操纵股票和证券，成功吸纳了其他阶级的闲置货币资本，从而获取了巨大的投机利润。这些股票或证券所产生的股息或利息，实际上是以生产剩余价值的实际能力为后盾的，这就要求人们在选择购买时需要上市公司充分披露财务状况。但上市公司却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模糊股票的真实价值和所代表的价值之间的关系，以此来操纵股票的价格。这使得交易所的投机活动更像一场赌博。但对金融资本这个幕后操盘手来说，这是一场“稳赢”的游戏，这就导致“收益本身不是直接由剩余价值的生产来约束的，而是由分配的规则和一整套制度安排来中介的”^②。这种规则和安排掩盖了收益与实际价值的关系，使得民众在金融资本的虚假话语中被剥夺了大量的财富。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极大地增强了金融资本在全球市场上的操作灵活性，而且显著提高了其在各种投机活动中的效率。“2000 年，IT 投资占了总投资的 45% 左右……因为信息技术更适合用于投机行为和最大化短期市场合同，而不是用于提高生产。”^③ 高频交易（High-Frequency Trading, HFT）是一种依赖强大计算能力和极速网络连接的交易方式，它允许交易者在毫秒甚至微秒级别进行股票买卖。通过使用先进的算法和超快的数据传输，金融资本能够在其他市场参与

①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 33 万亿美元 政府停摆风险加大》，https://content-static.cctvnews.cctv.com/snow-book/index.html?item_id=10636627719686668248&t=1695191801731&toc_style_id=feeds_default&track_id=F0DB3C89-4B30-404B-A2C1-9B201F2B8483_716900729982&share_to=wechat。

② [美] 大卫·哈维：《资本的限度》，张寅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年，第 437 页。

③ [美] 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年，166 页。

者之前识别趋势并执行交易，这种方法大幅增加了获得短期利润的机会。在全球股票市场，如纳斯达克和纽约证券交易所，自动化交易系统允许基于预设条件的自动买卖。这些系统可以分析大量数据，快速作出交易决策，促进了投机活动的精确性和响应速度。2010年，全球股票市场上的股票总市值超过50万亿美元，全球证券交易所股票（含投资基金）成交金额达到了63万亿美元^①。金融资本还打造了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品，如期权、期货、掉期和各种复杂的结构化产品等，这些工具允许金融机构构建复杂的投资组合，对冲风险的同时，也大量用于投机活动。这种技术驱动的金融活动将股票、证券等交易市场变成一个与实体经济完全脱离的“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②。

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创造了一个不经过任何生产过程就能获得利润的财富转移机制，使金融资本寡头获得了高额利润，寄生阶层也发展壮大起来。它们不创造任何真实价值，而是以吸食劳动者在生产领域创造的财富为生。金融资本利用信用机制让更多的人加入金融游戏，然后利用投机、贷款等方式榨取全体人民的财富，导致社会两极分化严重。21世纪以来，美国占总人口0.1%的最富有家庭拥有财富已经和占人口90%的家庭不相上下^③。金融资本的本质是吃利息、吃租金和吃差价，它在剥夺性积累中得到的财富归根结底来自生产部门。因此，这些金融资本家寄生在实体经济领域的劳动者身上。随着时间的推移，金融从业人员的数量持续增长。据统计，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美国的金融业从业人员比重从7%提高到18%，日本从4%提高到15%，英国则从2%提高到12%^④。这说明越来越多的人涌入非生产领域，成为金融资本的新仆役阶层的一员，为金融资本的寄生性所服务。总的来说，金融资本主义未能创造更加高效的经济体系来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反而不断通过债务积累转移社会财富，使劳动者承担更重的经济负担，因为“劳动者的渐进式收入和财富税已经被扭转为吸收薪资以补贴私有化食利阶层的手段”^⑤。

三、金融资本剥夺性积累的后果：全球经济的深度萎缩与债务危机

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虽然看似实现了财富的快速增长，但在其实际发展中，却不断地再生产出反生产性的力量和内在危机，从而侵蚀了生产性积累的基础，也对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构成了威胁。在这种积累逻辑中，虚拟资本凭借其高额的“增殖”效应和对快速回报的承诺，受到社会各阶级的高度推崇，并在信用扩张中得到进一步增强。这种对虚拟资本的狂热追求虽然可以

① 参见张志前：《货币泡沫——从全球危机到全球通胀》，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年，第6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0页。

③ 参见杨玲、胡连生：《论资本主义的金融化及其社会矛盾的加深与激化》，《理论探讨》2017年第4期。

④ 参见姬旭辉：《当代资本主义的金融化趋势及对中国的启示》，《科学社会主义》2019年第1期。

⑤ [美] 迈克尔·哈德森：《西方金融资本主义道路之失：以债务“创造财富”》，张宇晶译，《理论与评论》2018年第5期。

在极短时间内解决资本过剩问题并提高利润率，创造出经济繁荣的假象；但也进一步强化了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策略，加剧了市场不平衡，为经济发展埋下了长期风险隐患。一方面，虚拟资本的过度投资引发实体经济规模锐减，导致了泡沫经济的形成；另一方面，信用体系的过度滥用加剧了经济的脆弱性，其中任一环节的破裂，都有可能引发连锁反应，进而导致债务危机。而产业萎缩和债务危机的相互加剧，会对整个经济系统造成重大冲击，有可能使全球资本主义发生更深层次和更大范围的危机。

（一）产业萎缩：虚拟资本过度积累的必然结果

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导致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严重脱节，使“投机支配生产”^①成为现实。虚拟资本以信用系统为主要依托，可以不经产业资本的循环直接实现钱生钱的自我循环。在今天的金融化时代，金融资本不再依赖于实体产业的持久发展，而是转向寻求短期高回报的金融投机行为，特别是在股票市场、期货市场和其他证券市场上，通过各种金融衍生工具和高杠杆操作，对资金流向进行控制，从而限制了实体产业的资金投入。有学者指出：“过去三十年左右，美国和英国的资本积累毫无疑问地以投机倾向产生的利润为标志，这些投机倾向与停滞的生产性经济脱钩，但又主导着生产性经济。”^②在剥夺性积累所带来的高利润诱惑下，大型工业企业和产业资本家也转向非生产性领域，进一步削弱了对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这直接导致传统工作机会的比例下降。据统计，“金融部门在美国GDP中所占份额从1950年的12%大幅增加到2003年的24%，而同期在就业中所占份额仅从不到5%略微增加到7.5%”^③。这种过度的虚拟资本积累，“寄生虫那样紧紧地吸附在它身上，使它虚弱不堪……使它精疲力竭，并迫使再生产在每况愈下的条件下进行”^④，导致产业资本的持续萎缩，深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性弱点。

虚拟资本的过度扩张导致了经济泡沫，严重损害了生产性积累的经济基础，形成了一个自我增强但不可持续的经济循环。“有的专家系统研究美国60年的历史，发现金融、房地产、社会服务等加在一起占其经济总量的70%以上，而汽车、化工、机械、装备等制造业仅占13%，目前美国GDP与虚拟资本的比例大体为1:36，其中有70%左右的泡沫。”^⑤这种泡沫经济在房地产投机领域尤为显著。金融机构为地产商、中间商和普通民众提供贷款，甚至鼓励投机以推动房价上涨，进而形成经济泡沫。2007年，房地产泡沫在新房价格膨胀过程中创造出了大约

① 裘白莲、刘仁营：《资本积累的金融化》，《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9期。

② Onyebuchi Ralph Chima and Paul Langley, “Putting Humpty Dumpty Back Together Again: Financialisation and the Management of the Subprime Mortgage Crisis”, *Global Society*, Vol. 26, No. 2, 2012.

③ Christoph Scherrer, “Reproducing Hegemony: US Finance Capital and the 2008 Crisis”, *Critical Policy Studies*, Vol. 5, No. 3, 2011.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4-675页。

⑤ 张新宁：《现在世界不存在垄断资本主义吗？——兼评当前的帝国主义时代过时论》，《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年第4期。

8 万亿美元的财富，在总额为 20 万亿美元的房产价值中占据大约 40%^①。随着金融资本的集中和扩张，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进一步加剧。金融资本家和高收入的金融工作者赚取巨额利润，而普通工人和生产性行业的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停滞。这种分配不平等不仅削弱了消费能力，还降低了广泛的经济增长动力。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实体经济将难以填平虚拟经济创造的巨大泡沫，而金融资本则会继续在虚拟经济中寻求高额回报。2020 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 -3.5%，但美国资本市场仍保持较快上涨，其中纳斯达克指数 2020 年涨幅达到 43.65%^②。这表明实体经济的下行与虚拟经济的繁荣已形成一种“共生”的状态，但实际上这种状态是不可持续的。

（二）债务危机：金融资本信用滥用的后果

金融资本剥夺性积累主导下的债务高度膨胀，使得经济关系越来越表现为债权债务关系，形成了以虚拟价值为基础的金融体系。债务飙升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最显著的特征，“将所有债务合并计算，全美债务总额在 GDP 中的比率从 1959 年的 151% 令人震惊地上升到了 2007 年的 373%”^③。这种庞大的债务堆积隐藏着危机的种子。金融资本的债务是以虚拟价值为基础进行累积的，本质上具有高度脆弱性，资金链条上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瑕疵，都有可能引发金融连锁反应。而日益增加的投机活动也使资本市场的稳定性进一步放大。当这些以高风险和高回报为特征的金融产品无法转化为实体经济中的真实价值时，信用就会在链条的薄弱环节发生破裂，必定引发大面积的债务违约，最终导致整个信用体系的崩溃。此时，虚拟资本价格也将不再代表社会财富，而是转变为债务堆积，并转化成危机的源头，对金融资本体系和国家经济构成威胁。

国家的债务化趋势在金融资本主义的背景下愈益凸显，蕴含了主权债务危机发生的可能。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国债市场经历了巨大的扩张，在国债市场上占据首位的美国，“1980 年的国债日交易量仅为 140 万亿美元，到 1993 年已剧增到 1200 亿美元”^④。这一增长不仅表明了资本市场规模的扩大，也反映了国家金融化程度的加深。事实上，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前，许多欧洲国家就已因高额债务而面临经济结构的脆弱性。然而，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却没有利用债务资金改善经济结构，反而加大消费和福利等非生产性支出，为危机埋下严重隐患^⑤。西方资本主义政府在试图通过增发国债来解决财政赤字和刺激经济的过程中，实际上深化了其对金融资本的依赖。这种依赖不仅使政府越来越成为金融资本意志的执行者，还加剧了公共债务的不断累

① 参见〔美〕大卫·科茨：《当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一个新自由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刘霞译，《上海金融学院学报》2010 年第 2 期。

② 参见李世美等：《虚拟经济繁荣与实体经济放缓：金融化的分层解释与治理》，《金融发展研究》2022 年第 1 期。

③ 宋朝龙：《西方金融资本主义下的寄生阶级、债务通缩与大萧条——兼评迈克尔·赫德森的金融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政治经济学评论》2021 年第 12 期。

④ 〔法〕弗朗索瓦·沙奈等：《金融全球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年，第 106 页。

⑤ 参见郭万福：《国际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原因及启示》，《产业创新研究》2023 年第 18 期。

积，导致政府债务水平不断攀升。在美国，截至2010年9月30日，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余额达13.58万亿美元，GDP占比约为94%^①。规模如此巨大的债务如果不能通过生产性经济活动得到补偿，就可能导致严重的货币贬值和信用危机。

（三）深度危机与全球危机：产业萎缩和债务危机的负面交互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②在金融资本剥夺性积累逻辑的支配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走向一种高剥夺、低生产的自我否定模式。这一趋势在银行系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当代银行系统可以在没有价值作为基础的情况下，通过债务凭空创造信用货币，这些货币所代表的不是“价值”，而是“反价值”，因为其所造成的债务要用未来生产的价值去偿还^③。只有当未来的剩余价值足以抵消这些债务时，金融资本才能继续增长，否则，信用体系便有崩溃的风险。在产业资本主义时期，当经济下滑时，债务规模也会随之减少。但在金融资本主义时期，经济衰退与债务规模的扩张同时发生，这导致了债务与生产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从而增加了债务违约的风险。随着产业资本的不断下行，大量无法偿还的债务累积起来，加剧了经济的停滞；在经济停滞的局面下，金融资本更加依靠债务来刺激经济增长，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债务的规模。在实体经济持续萎缩的背景下，债务的膨胀已经超越了资本生产性积累的界限。当债务累积到无法偿还的程度时，泡沫破裂、银行破产、股市崩盘的局面就随时可能发生。比如，在希腊主权债务危机期间，由于过度借贷和财政赤字的飙升，希腊政府债务达到无法偿还的程度，导致国家信用评级下调、国际市场融资成本大幅上升，最终引发了一场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各国央行普遍采取了量化宽松政策，大量注入流动性以稳定金融市场。但这种应急措施并未从根本上扭转金融资本剥夺性积累的逻辑，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金融资本的力量，为未来更大规模的危机爆发提供了可能。

为了进一步转嫁危机和弥补国内生产不足的问题，金融资本利用数字技术等先进的经济手段，将虚拟经济主导的经济模式不断巩固并延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财富剥夺。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由金融资本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积极促进其他国家走向私有化和金融化。在全球资本市场中，每日约有万亿美元资本在外汇和证券市场进行投机交易。利用先进的通讯和信息技术手段，这些资本频繁跨国流动，使得大量资金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转移至全球各个角落。之后，金融资本通过精心制造债务危机，引发大规模货币贬值和资产缩水，然后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助释放廉价资产以实现经济复苏。在这个过程中，金融资本以低廉价格大量收购资产，使得落后国家的财富被发达国家劫掠。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导致阿根廷陷

① 参见王西民：《债务危机：困境、根源及其解决机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比较分析》，《财经科学》2013年第2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8页。

③ 参见牛子牛：《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金融化批判：金融资本的时间化与货币增殖的极致化》，《世界哲学》2023年第5期。

入严重的财政赤字，大量资金外流，很多财富和资产通过银行被转移到西方政治经济精英手中。“世界范围内的危机制造、危机管理、危机操纵，已经发展成为一场精心的再分配表演，将财富从贫穷国家转移到富裕国家”^①，这使“食利者阶层完完全全脱离了生产，给那种靠剥削几个海外国家和殖民地的劳动为生的整个国家打上了寄生性的烙印”^②。同时，这种国际性的剥夺性积累不仅加剧了国际经济的不平等和脆弱性，也引发了全球经济对金融体系的深度依赖，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停滞。由于金融资本的全球流动，金融风险的影响范围也向全球扩展。2007年，美国投机性抵押贷款和衍生债券泡沫破灭，引发了震惊世界的2008年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拉开了大衰退的序幕^③。当前，全球经济在西方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逻辑主导下，已步入一个充满危险和不确定的阶段，世界经济结构相互依赖，产业萎缩与债务危机相互促进，构成了一种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模式。这种模式的广泛性和深远性预示着潜在的、更为严重的危机即将到来，对未来的经济稳定构成严峻挑战。

四、结 语

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它揭示了资本主义内在的逻辑和发展动态。这一过程不仅仅是经济活动的一种现象，更深刻地重塑了全球的经济结构。金融资本通过剥夺性积累，利用虚拟经济和信用体系，加剧了资本积累的不平等性和不稳定性，造成了实体经济的持续衰退和社会不公的加剧。正是这些剥夺性积累策略的复杂性和广泛性，使得金融资本能够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分配财富。同时，这些策略常常隐藏在复杂的金融工具和市场机制之后，难以为大众所理解。金融资本的这种活动不仅对经济周期和市场波动有着巨大影响，而且对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的决策构成了严峻挑战。在这种动态中，不断扩张的虚拟资本和不断累积的债务危机，透露出资本主义系统内在矛盾的加剧。因此，我们面临的挑战不仅是理解这些金融掠夺的经济后果，更关键的是要应对它们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后果，深入探索如何通过更有效的政策和经济实践，来缓解由金融资本导致的这些深层次问题，从而确保经济和社会的长期稳定和公正发展。

（崔慧敏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1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林 文]

① [美] 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第169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61页。

③ 参见张雪琴：《停滞金融化悖论与马克思归来——基于欧债危机的视角》，《中国图书评论》2018年第1期。